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基础

孙守增

(长安大学 杂志社,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从理论和实践 2 个方面论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和发展的必然性。分析认为,毛泽东思想中的统一战线理论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理论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尤其是 1946 年的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实践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统一战线理论;理论基础;实践基础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0)04-0060-0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自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之日起,她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全国工商联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舞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重要标志,并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何以在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又何以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呢?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探究其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进而寻找出答案。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理论基础

我们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理论的结晶。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创造性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之一,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和最大的成果之一。统一战线的最初形成是阶级的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科学分析后得出的必然结论。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建党之初,就决定了其进步性,把中国人民的翻身得解放作为其历史使命,但由于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尽管建党后领导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工人活动,但都受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对于失败的原因,当时只有毛泽东同志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分析,其原因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而之所以

收稿日期: 2010-11-12

基金项目: 陕西省委统战部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重点课题(STZL2009J09)

作者简介: 孙守增(1963-),男,辽宁本溪人,长安大学编审,陕西省政协常委。

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决策层缺少对中国具体国情的科学认识,而当时对中国具体国情有着科学和清醒认识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冬季写就的2篇毛泽东思想的奠基性文章,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另一篇是《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就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sup>[1]</sup>。

随后,毛泽东同志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按其经济基础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并对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科学论断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必然性,并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构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sup>[1]</sup>。

结合这2篇文章,可以把毛泽东同志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大致分类、构成、革命的态度作一分类(表1)。

表1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级分类

分类	大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
构成	大地主、外国资本家等	民族资本家、小地主、工商业家等	自耕农、手工业主、知识分子、小商员、半自耕农、手工业工人、小商贩等	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无业游民等
数量	100万人	400万人	3亿人	4 500万人
态度	反革命	革命的两面性	革命的不坚定性	革命的坚定性
代表	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极右派	国共两党之外的右倾党派	国共两党之外的左倾党派	共产党

从表1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中,革命的死敌大资产阶级只有100万人,在中国当时的4亿人口中只占0.25%,而作为具有

革命两面性的“中产阶级”占中国总人口的1%。作为具有革命不坚定性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占中国当时总人口达87%,而具有革命坚定性的无产阶级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4%左右。具有革命性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合计占人口比例达到98.75%。毛泽东同志总结道:“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sup>[1]</sup>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的阵线”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2篇文章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进而也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中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在以后的中国革命斗争中,根据不同时期的革命目标,毛泽东同志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并做到了团结我们最大多数的朋友,孤立我们的敌人,形成了中国革命的广泛统一战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最广泛联盟基础。虽然在1946年1月1日旧政协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创建政治协商这一会议制度形式,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斗争中,为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始终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倾听同盟者的意见和建议,并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重大决策,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不断壮大,这些都体现了政治协商的本质和精神。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实践基础

1944年,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已开始显露,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成长,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日益深得人心,蒋介石的反共主张也日益强化,并不断制造摩擦。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如何建设中国这一现实问题开始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是建设一个由国民党反动派一党独裁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建设一个由人民当

家作主、各党各派参加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抉择,摆在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共产党面前。此时,中国共产党把召开党派会议作为配合实现建国思想的斗争策略,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政治主张。1944年8月17日,周恩来同志在起草给身处重庆的董必武、林伯渠电报中提出,“请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毛泽东同志在这封电报上批示道:“应先召集党派和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sup>[2]</sup>。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先召开国民大会,挟持民意,以达到其独裁统治的目的。1945年2月,周恩来就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和平建国问题向国民党递交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主张党派会议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联合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等4条<sup>[3]</sup>。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和具体纲领,提出了中共的建国思想和路线,并要求“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sup>[4]</sup>。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sup>[5]</sup>。1945年9月,周恩来和王若飞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再次要求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1945年10月10日,中共和国民党在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终于达成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称《双十协定》)。在《会谈纪要》的第二条中载明“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sup>[5]</sup>。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代表团成员有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叶剑英(后由秦邦宪代替)、陆定一、邓颖超。

值得指出的是,国民党为了控制多数代表,使政

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利于他们的提案,使出种种手段拉拢民主党派,妄图孤立共产党。为了分化民盟代表团,他们以高官厚禄拉拢民盟领导人罗隆基,遭到罗隆基的严辞拒绝。国民党的张群、吴铁城对民盟中央常委、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勱、张东荪做了许多拉拢工作,蒋介石也亲自出面,以自己的名义,特别设宴款待张君勱和张东荪,其企图也未能得逞。随后,又唆使青年党领袖曾琦分裂民主同盟,答应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私下许愿给青年党5个代表名额。由于国民党的离间和收买,青年党突然提出要在民盟9名代表名额中占5个名额。在遭到拒绝后,青年党吵嚷着要坚决退出民盟,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国民党紧密配合,公开支持青年党的要求,想削弱民盟在政协会议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代表团为了针对国民党进行斗争,加强了与民盟的团结与合作,坚决支持民盟。周恩来同志多次向民盟领导表示,民盟原定的9名代表名额不能减少。他还提议,民盟仍保持9名代表,青年党以独立单位参加,占5席。解决增加名额的办法是:共产党让出2个名额,变为7席;国民党让出1个名额,变为8席;另外,总额增加2名;代表总额由原定的36人增至38人。中共为了顾全大局,主动让出名额的做法,感动了民盟,民盟决心同中共全面合作,结成亲密同盟;同时,也向全社会揭露了国民党的不良居心。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与会代表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代表9人,基本上形成了左、中、右3种政治势力。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的力量,力争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同盟基本上是中间势力,主张通过和平改良方法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国家;国民党及青年党顽固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由于3种政治势力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展开了尖锐复杂的博弈。其中焦点集中在2个方面: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会议期间,中共代表与民主同盟代表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共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相互支持,并团结其他爱国人士结成反内战、争民主的联盟,同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在军队问题上,与会各代表一致主张军队国家化,但在实现军队国家化的程序安排问题上存在着

重大分歧。国民党坚持先军队国家化才能政治民主化,其用意就是要共产党先把军队交给国民党政府,再实行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坚持军队国家化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先政治民主化,再军队国家化,以政治民主保障军队国家化。中间势力主张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并希望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为了团结中间势力,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中共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周恩来表示中共赞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但坚持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必须同时进行。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最后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离、军民分治等一般性原则以及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代表三人小组继续商定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办法。

在政权问题上,首要的问题是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实现政治民主化。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案》,声称不是改组,而是扩大“国民政府委员会”。依照其提案,国民党在政府中占有“特定程度的多数”;国民党以外人士参加国民政府,须由主席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只有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的权力,而无用人权;国民政府主席有相对否定权和紧急处置权,等等。可见,国民党并不是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和宪政,只是希望增加几名党外人士参加政府以装潢门面,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中共代表和民盟代表当即识破国民党的把戏,相继反对这项提案。罗隆基指出,改组政府的目的在于使国家“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结束训政完成宪政”,“各党派能参加政府”。改组政府必须遵循3项原则:一是必须以共同通过的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二是共同决策机构,要真能决策;三是各方面人员参加执行机关,要真能执行。罗隆基并提出7点质问,揭露了国民党企图一党专政的用心。中共代表董必武支持罗隆基的发言并强调指出,应当在有共同通过的纲领的基础上改组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有权决定人选,政府的主要职员,大党所占的比例不要超过1/3。经过艰苦的协商讨论,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施政纲领确定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保持国家的和平发展;规定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并拥有人人权;规定政府委员名额的1/2由

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有出席委员的2/3赞成始得议决等。如果实行这样的政府改组,国民党虽然在其中仍占有主要地位,但它已经不能为所欲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将拥有能够保障施政纲领不致被曲解、变更、撕毁的否决权。

改组后的政府应是从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它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的任务。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之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制度接近于英、法等国实行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实行这种政体,虽仍不能改变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本质,但对于蒋介石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这是向政治民主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宪法草案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则,规定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要制定省宪,等等。这类规定,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起到一种保障作用。

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由于中共的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5项协议。这些协议虽然还不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已非常接近,而且它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国民党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迫使国民党承认党派存在的合法性和各党派的平等地位,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所有这些,是符合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愿望的,代表了当时人民的利益的,是人民民主势力的胜利。

旧政协所取得的成果,虽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人民路线而遭破坏,但全面反映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主张,是中共统一战线理论的一次重大的标志性实践,为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导地位,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中,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为新的历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传承,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平等协商的优良传统也得到了继承,中共在旧

政协所追求的民主、和平建国的方略在新政协中得以胜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理论不断创新和与时俱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进一步明确,其地位也得到了巩固,其任务和使命也日益光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 三、结 语

(1)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武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光芒。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分析,认清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国情,并反复强调对国情认识的重要性。毛泽东在 1939 年 12 月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sup>[6]</sup>;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对中国在不同的革命阶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着理性的认识,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把广大农村的无产者纳入无产阶级范围,创造性地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同时为中国革命所需要形成的最广泛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由于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僵化使用,继续迷信于阶级斗争,以至于把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推到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对统一战线事业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整个文革期间停止活动也就在所难免。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的国情发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统一战线事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重回正轨。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有了坚实发展的强大理论基础。

(2)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提出的,在 1946 年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展示了自己的建国方略,目标是建立全体中国人民的联合政府,最终达到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方法和手段是民主和团结,通过召开各党

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和军事 2 个方面达成协定;途径是召开真正人民直选的国民大会,并使之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建国方略不但得到各民主党派的高度认同,而且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坚决拥护;这一建国方略也使中共站上了民心的制高点,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当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时,就注定了其民心向背,就注定了其加快失败的命运。因而,1948 年中共“五一口号”发表后,才有了民主党派必然群体响应,才有了 1949 年新政协的顺利召开,最终使在旧政协不可能实现的建国方略在新政协得以真正实现。可以说,政治协商会议的提出和召开,在新中国的成立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使中国人民不断富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虽然阶级矛盾不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和涌现,社会分层使新的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阶层之间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也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不但没有丧失他们存在的群众基础,而且成为一定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在调和社会结构矛盾方面将进一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在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建设中更加注意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强化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为中国人民统一战线事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实践基础。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3] 李新总,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5 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下转第 76 页)

## China's governments image shaping under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GAN Jia-hu<sup>1</sup>, PENG Zhi-yuan<sup>2</sup>

(1.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Jiangxi China

2. School of Postgraduat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be the issue of how governments should shape their own image under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radox of distance under China's context and the challenges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will bring about to the image shaping of China's government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aradox of distance in China is contrary to the paradox of distance in the USA.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will not only bring great opportunities but also challenges for Chinese governments in undertaking the drive to make them a good new image. To shape a good image, 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by Chinese government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ir image consciousness, perfecting E-government projects, upgrading governments' competence in handling media and promoting the openness of the governments' affairs, etc.

**Key words** network communication; shaping governments' image; the paradox of distance; opportunity as well as challenge

(上接第 64页)

## Theoretical and practice basis for National Committee of Chinese People's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SUN Shou-zeng

(Department of Magazine Publishing,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necessity for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ing National Committee of Chinese People's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NCCPCC) is discussed fro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e aspect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united front theory in Mao Zedong thoughts is the theory basis of NCCPCC, and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opening of old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gress in 1949, is the practice basis of NCCPCC. At the new historical time, the Deng Xiaoping theory, three represents, and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set up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developing NCCPCC,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esents a practice basis for developing NCCPCC.

**Key words** NCCPCC; the united front theory;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e base